

在文明的邊緣

陳方正

一個9月晴朗早晨，在完全沒有徵兆情況下，世界最強大經濟體系和軍事體系的神經中樞先後受到近乎毀滅性的襲擊，導致資本主義世界心臟抽搐和整體癱瘓。現在它雖已好像從震驚暈眩之中恢復過來，正在採取強力措施證明其堅固不可動搖，但再也無從否認或掩飾的是：它基石之中的致命裂痕已經無情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全球經濟衰退已無可避免，全球意識中的深刻、不可逆轉基本變化正在形成——人類現在真正進入二十一世紀了。

「九一一事件」被形容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恐怖主義行動」，是「向美國開戰」，乃至不僅代表「文明間的衝突」，更應視為「針對文明世界的野蠻行為」。當然，這些言論原只不過是憤怒、惶惑、悲痛情緒的反映，其缺乏深刻理據或周密考慮並不足怪。然而，情急之中吐露的直言往往包含至理，因此，仔細審視、分析這些說話，亦未嘗不是了解這一事件之本質，從而剖視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美國與世界關係的一個起點。

「九一一事件」被形容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恐怖主義行動」，要真正了解其本質，我們卻不得不問：到底恐怖主義是甚麼？可以說，它是弱者以不可逆料和不顧一切的方式攻擊強者，是少數對絕大多數的公共秩序之挑戰。問題是：其成因究竟何在？

一 恐怖主義是甚麼？

「九一一事件」之為恐怖主義行動並無疑問，然而，要真正了解其本質，我們卻不得不問：到底恐怖主義是甚麼？如所周知，它是指身份、行為隱蔽的少數人，通過不顧自身安危乃至注定自我犧牲的方式，以突然和毀滅性暴力行為，攻擊社會大眾或者有重大價值的目標。換言之，是弱者以不可逆料和不顧一切的方式攻擊強者，是少數對絕大多數的公共秩序之挑戰。問題是：這種缺乏法理正當性和社會認受性，又須冒極大風險乃至自我犧牲的極端行徑到底何以會出現？其成因究竟何在？

大體上，恐怖主義者有三種迥然不同類型：罪犯恐怖主義，即為了謀取暴利而藉恐怖活動脅迫有能力支付巨額贖金者；宗教恐怖主義，即個人（例如美國

郵彈殺手Unabomber Theodore John Kaczynski) 或者邊緣宗教團體(例如日本奧姆真理教) 基於幻異信仰而作出超乎常理的恐怖行為者；以及政治恐怖主義，即弱者為了達到其強烈政治訴求而不惜犧牲一己者。在這三者之中，第一及第二類型的目標沒有公共性，所以往往被政府視為普通罪犯，以刑法對付之^①。但第三類型卻完全不一樣：它並非圖謀私利，具有高度理性成分^②，而且，至少對某一族群而言，其目標具有高度公共性；此公共性更且有逐步擴展，在廣大基礎上獲得接受的可能。因此，對受到襲擊的政府或政治集團而言，這類型恐怖主義之危險不僅在於其行動直接造成的創傷，更在於其宣傳效應以及強大政治顛覆力量。因此，政府強調他們的罪行，但諱言他們的政治動機，竭力將他們與其他兩類恐怖份子混為一談，是很自然的。但這是否能為社會和國際所無條件接受，並對其反擊行動予以充分合作，卻是非常複雜的政治問題。

很明顯，「九一一事件」是不折不扣的超級政治恐怖主義行動。它引起美國政府如此的惶急和憤怒，正是由於其在直接造成巨大社會與經濟災難以外，還徹底改變了國際政治意識：不但美國國家安全與力量的可靠性頓成疑問，美國以及整個西方陣營歷來對伊斯蘭世界採取高壓政策所累積的仇恨、敵意之深，所產生的危險之大，亦因此而暴露無遺。現在美國政府痛下決心，要以雷霆萬鈞之勢犁庭蕩穴，斬草除根，其目的不僅在於報仇雪恨，而更在於藉此彌補其嚴重受損的威望，重新樹立其受到正面挑戰的全球領導地位。以美國目前的政治氣候特別是其領導層的一貫作風來說，這種激烈反應非常自然，甚至可以說是在民意壓力之下不得不爾之舉；然而，從長遠來說，到底是否明智，實不能無疑，而軍事行動一旦開展之後，分寸到底應當如何掌握，更是對主政者乃至美國本身的嚴峻考驗。所謂鑒往以知來，要明白這一考驗的意義，則在一個更長遠和寬闊的框架中來審視和剖析政治恐怖主義，是有必要的。

恐怖主義者有三種迥然不同類型：罪犯恐怖主義、宗教恐怖主義、政治恐怖主義。在這三者之中，第一及第二類型的目標沒有公共性，但第三類型卻完全不一樣：它並非圖謀私利，具有高度理性成分，而且其目標具有高度公共性。這類型恐怖主義之危險不僅在於其行動直接造成的創傷，更在於其宣傳效應以及強大政治顛覆力量。

二 政治恐怖主義的譜系

「九一一事件」似乎是獨特，前所未有的。然而，其獨特和「開創」意義到底何在？要回答此問題，不能不先回顧政治恐怖主義的歷史。事實上，自古迄今，以非常暴力手段求達政治目標是非常普遍的：遠者如〈刺客列傳〉中的專諸、豫讓、聶政、荊軻，乃至運大鐵椎施博浪一擊的力士都是其濫觴，近者如十九世紀俄國以刺殺大臣、沙皇為能事的「人民意志」革命黨，今日之愛爾蘭共和軍、錫蘭的泰米爾之虎、西班牙的巴斯克分離主義份子等等，則是典型恐怖主義份子。他們與專制君主或者另一強大民族的對抗大多以失敗告終，或者僅能造成長期僵持之局。然而，卻也不乏少數間接和直接成功的例子：前者如「人民意志」之失敗導致「布爾什維克」之出現，後者如愛爾蘭之得到獨立以及北愛之走向自治。

所以，作為政治工具，恐怖主義本身的力量其實頗為有限，但在更高層次理念指導或者相應政治組織配合下，則其作用會迥然不同。這一關鍵可以用中古時代兩個不折不扣的恐怖主義活動的成功前例來說明。其一，是西西里島民眾在外部勢力（主要是西班牙半島上的阿拉岡王國）挑動之下，經過數年密謀，於1282年復活節的狂歡之中陡然發難，大事屠戮他們所痛恨的法國士兵，打敗高壓統治者查理安周 (Charles of Anjou) 的軍隊，並且與為他撐腰的羅馬教皇頑強對抗，經過20年艱苦鬥爭之後實際上奪得自行選擇領主的權利。這一名為「西西里晚禱」(Sicilian Vespers) 的早期平民革命事件震驚了全歐洲^③，它不但直接導致查理安周正在野心勃勃地建立的龐大地中海帝國之完全破滅，而且成為格力高利七世 (Gregory VII) 二百多年前所建立、當時勢力如日中天地覆蓋全歐的羅馬天主教廷權力走向沒落的起點。這可以說是弱小民族憑藉恐怖活動之一擊與島國天險的保護而抗拒普世帝國力量，至終導致後者之衰落的罕有例子，亦是民族主義出現的先聲。

中古時代有兩個恐怖主義的成功前例。其一是1282年名為「西西里晚禱」的早期平民革命事件，它直接導致查理安周的龐大地中海帝國之完全破滅。第二個例子是1090-1257前後將近170年間，盤踞於伊朗西北部強固據點，以暗殺為能事的伊斯梅小教派，英文「暗殺者」(Assassin) 一詞亦正是從他們得名。

第二個例子是盤踞於伊朗西北部強固據點，專門以暗殺為能事的伊斯梅 (Ismaili) 小教派，十字軍所傳說的神秘「山中老人」，所指的就是他們前後三代首領哈山 (Hansan)，而英文「暗殺者」(Assassin) 一詞，亦正是從他們得名。他們有三個特點：首先，他們不但反對伊斯蘭教主流即遜尼派 (Sunnis)，亦大有別於在伊朗流行的什葉派 (Shi'ites)，所以是由特殊信仰而產生理念上的凝聚力。其次，是政治上反抗塞耳柱土耳其人 (Seljuq Turks) 在十一世紀中葉所建立，以正規軍隊與官僚管理系統為特色的伊斯蘭普世帝國。第三，他們本着山地驍悍民族的特色，以多個獨立小社區為基礎組成鬆散政治聯盟，並派出許多身份隱蔽的專業刺客，在大城市中有意識，有計劃地以暗殺行動鏟除政要，顛覆政權，製造恐怖氣氛，從而為本身的生存創造條件。在公元1090-1257前後將近170年間，這一教派以亞拉勿 (Alamut) 天險堡壘為基地，多次抗拒圍剿他們的大軍——甚至最後其為蒙古大軍消滅，亦並非戰敗，而是由於首領在甘詞厚幣引誘下喪失鬥志，自行投降^④。九百多年前的伊斯梅教派處於伊斯蘭帝國邊緣，今日千夫所指的所謂「拉登集團」則處於西方世界邊緣，兩者在理念、組織、行徑上頗有吊詭的一脈相承之處，這到底是巧合，是宗教、地理、民族心理等因素相近使然，或者是有意識的模仿，甚至數者兼而有之？那就無法輕易下判斷了。

從上述歷史先例可以清楚見到：政治恐怖主義不但可以有其正當性，而且有可能持久，並且在更廣大的政治舞台上產生遠遠超乎其本身具體訴求的長遠後果，所以是不能視為瘋狂行徑而輕忽、蔑視之的。

三 恐怖主義與戰爭之間

當然，「九一一事件」與上述種種恐怖主義活動無疑還是有巨大差別。首先，整個行動與現代科技密不可分：從其利用受劫持的噴射民航客機撞毀摩天

大廈作為襲擊方式，以至其所造成的巨大創傷之性質（六千生命誠可貴，但全球經濟所受的沉重打擊則更深遠可怕），乃至其通過電訊網絡所獲得的巨大宣揚效應（大廈爆炸及倒塌景象即時映入全球人類眼簾，猛烈衝擊全人類神經與思維），無一不清楚顯示，這是非常敏銳地窺破了現代世界之通過科技而獲得高度整合這一特徵，從而抓住其內部致命弱點，經過周詳策劃，然後施以狠狠一擊的堅決行動。這一行動中所有組成要素，諸如噴射民航客機、世貿摩天大廈、全球性金融體系、全球電視網絡等等，都是過去半個世紀之間方才出現的新生事物，它們促成了全球資本主義帝國，同時亦使得十數名具有堅決意志的死士能夠直接對其心臟施以致命攻擊，這在數十年前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更重要的則是，觀乎此行動目標之大，構思層次之高，它其實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政治恐怖主義之以某種清晰、具體政治結果為目標的形態，而儼然擺出與全球資本主義世界公然為敵的姿勢。所以，稱之為「向美國開戰」，實在不無道理。但是，無論其起因為何、目標為何，戰爭都是非常殘酷的事。假如真要從戰爭角度來客觀衡量「九一一事件」，其後果卻又恐怕並非一般人所能接受。

首先，就事件最直接的後果，即六千餘人喪生這一點而言，其無辜、可悲、可憫，為所有具良知與同情心的人所同感哀悼，自不待言。它清楚顯示了一切戰爭之可恨可畏；覆巢之下，並無完卵的悲劇；乃至我們自身所處的社會中，也同樣可能出現的慘酷。然而，即使如此，在這時刻，人類仍然不應忘記，在過去一世紀間，以殺害平民為戰爭手段，是司空見慣，絕不希奇的事：二次大戰初期德國空軍肆意轟炸倫敦；二戰末期盟軍以毀滅性轟炸夷平德累斯登（Dresden）；美國更用原子彈摧毀廣島、長崎以求減低本身軍隊傷亡；而在越戰中，越南民眾與越共本無分別，故而像美軍在美萊村（May Lai）焚燒村莊，屠殺全村居民那樣的事件層出不窮。因此，倘若「九一一事件」的確是戰爭，那麼要客觀地分辨其六千死難者與德累斯登、廣島、長崎、美萊村、柬埔寨眾多死難者的悲慘命運，恐怕並非易事。譴責事件背後主謀為兇殘缺乏人性之輩，為人人得而誅之的暴徒，那無疑是悲憤填膺，情不自禁所致，可不必深論。但倘若要認真地評論是非曲直的話，那麼除非願意將事件主謀與直接或間接導致上述戰爭屠殺行為的政治、軍事領袖等量齊觀，否則便不能單單從殘殺平民這一事實來下結論，而必須究問戰爭何以會形成了。這一明顯而沒有多少人願意認真面對的尷尬事實，是不可忽視而值得深思的。

其次，「九一一事件」背後主謀在行動策劃上雖然空前成功，其戰略層面的表現卻令人迷惑。克勞塞維支（Carl von Clausewitz）在《論戰爭》（*On War*）中將戰爭定義為「為了強迫對方按照本身意志行事而採取的暴力手段」^⑥，其背後的假定是：發起戰爭者及其敵人都是具有明確地位、身份的主體；二者之間通過政治渠道而宣示的對立意志是清楚而眾所周知的；暴力只是手段而非目的，等等。當然，時至今日，戰爭早已非復十九世紀初講究規矩風度的武力遊戲，恐

觀乎「九一一」行動目標之大，構思層次之高，它其實已經遠遠超出了傳統政治恐怖主義之以某種清晰、具體政治結果為目標的形態，而儼然擺出與全球資本主義世界公然為敵的姿勢。所以，稱之為「向美國開戰」，實在不無道理。

怖主義行動與常規戰爭之間的界線亦已經變得模糊。然而暴力、敵對主體以及政治目的這三者迄今仍然可視為構成戰爭的要素：在越南戰爭、北愛天主教徒的長期獨立鬥爭、中東所爆發的多次戰爭中都是如此。「九一一事件」之令人如墮五里霧中，就在於它只有暴力以及受敵一方是明確的，至於發起攻擊的一方乃至其政治目標目前都還只能夠付諸猜測——雖然假定這是由西方國家長期宰制、壓迫中東、北非諸伊斯蘭國家所激發出來的行動，那應該不會離事實太遠。但絕不可解的問題是：為甚麼施以如此大規模和周詳攻擊的一方，自始至終沉默不發一言，既無預警，又無脅迫，更無任何政治要求或道義宣言？

最直接的解釋似乎是主謀者雖具有敏銳行動意識，但完全缺乏政治頭腦，所以不重視爭取國際社會支持與同情，甚至連與伊斯蘭國家和宗教團體取得聯繫的想法亦付諸闕如，以致事件發生之後舉世一片義憤譴責之聲，再也無人為其辯護。然而，揆諸事件策劃之周詳縝密，劫機者之從容鎮定，視死如歸，這一看法恐怕是太單純了，另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可能性是無法排除的：既然事件發生之後西方勢必傾盡全力緝兇和反擊，那麼如鬼如魅般消蹤匿跡，蟄伏待時，不但是簡單明智的自保之道，抑亦是沉默地保持威脅，繼續實施神經戰術的上佳戰略。至於這一行動的政治意義與訴求，由於過去將近一個世紀之久所積累的衝突與仇恨之深，其實即使沒有任何言說，亦都肯定能夠迅速為所有同情者與敵對者，乃至婦人孺子所充分明白，任何宣言、要求、威脅因此也都可以說是完全多餘的了。《老子》第五十六章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塵」所討論的是治理天下的道術，但在另一層面的意義，恰恰像是為這樣一種默守待時的策略和構想作了註腳。

倘若這一看法並非無稽的話，那末「九一一事件」便不但不是單純的政治恐怖主義行動，甚至也不僅僅為國家、民族之間的有限度戰爭，而的確是所謂「文明間的衝突」之表現了。倘若沒有深思熟慮的策略將之加以消解的話，這樣的衝突實有可能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整合過程中一個長期存在的癥結，的毒瘤，而其表現形式亦可能不斷詭異多變，層出不窮，為全球人類帶來意想不到的各種災難，這是全球社會所絕不能掉以輕心的。

四 文明衝突從何而來？

自90年代初以來，文明衝突論甚囂塵上，「九一一事件」之出現，似乎正好為這種論調提供證明。然而，這一事件所代表的，究竟是何種文明的衝突？它們之間何以會發生衝突？文明間的衝突是否一定不可避免？這些問題在在需加仔細辨析，而不是可以籠統回答的。

例如，以《論語》、《孟子》為源頭的中國儒家文明，就向來宣揚和諧，反對戰爭，即使在其成為官方意識形態之後，亦未嘗為帝國之開疆闢土提供理論根

自90年代初以來，文明衝突論甚囂塵上，「九一一事件」之出現，似乎正好為這種論調提供證明。這樣的衝突實有可能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文明整合過程中一個長期存在的癥結，而其表現形式亦可能層出不窮，帶來意想不到的各種災難。然而，這一事件所代表的，究竟是何種文明的衝突？文明間的衝突是否一定不可避免？

據或精神鼓勵。另一方面，希伯來民族必須在強敵環伺中求生存，所以《舊約聖經》中顯示的宗教信念充滿了鬥爭精神，與及對勝利、征服的渴望，其後這種尚武精神亦間接或直接遺傳於由其蛻變而來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西歐與伊斯蘭諸帝國的軍事抗爭延綿千年之久，其根源恐怕即在於此「希伯來思想基因」。十六世紀以還，歐洲向外擴張的原始動力既有人口和經濟因素，但名義上和底子裏亦復脫離不了「得人如得魚一樣」的梯山航海宣道精神。從十七世紀開始，經過科學、政治、思想、工業等各方面的革命，西歐基督教文明逐步蛻變為俗世化的現代文明，然而其向外擴張的動力不但未嘗稍戢，反而因為軍事、經濟力量之飛躍發展而更為強勁不可抑止，只不過其精神載體則轉變為資本主義罷了。今日不斷高漲的全球化浪潮，無疑亦正就是這種動力的最高表現。

所以，文明衝突並不是最近才出現的事：十九世紀資本主義文明向全世界擴張時所引起的嚴重衝突即表現為奧圖曼、俄羅斯、中國、日本諸傳統帝國所受到的西方軍事、政治壓力，以上諸帝國由是被迫拋棄傳統意識形態，轉而追求現代化，即基本上逐步接受以資本主義為核心的全球現代文明。在今日，土耳其、俄國、中國、日本之所以仍然能夠維持實質性（而非僅為名義上的）獨立自主，並繼續沿着本身文化軌跡發展，正是由於經歷了上述艱辛痛苦的蛻變歷程，所以對於在現代世界立國與自強之道獲得深刻了解，並且通過嚴酷戰爭洗禮證明其民族凝聚力之不可動搖。

另一方面，奧圖曼帝國自十九世紀以來逐步解體，其核心部分蛻變為土耳其共和國，但其中東、阿拉伯半島以及北非的大片領土則四分五裂，先後淪為歐洲列強殖民地，二次大戰之後才隨着國際氣候的轉變而一一獲得獨立，成為今日的伊朗、伊拉克、敘利亞、約旦、沙地阿拉伯、埃及、利比亞等伊斯蘭國家。這些處於人類文明最早發源地的國家至今尚未能現代化，也未能脫離西方勢力的羈絆，有兩項主要原因。其一，是伊斯蘭教義的強大保守性，這對於甚至像奧圖曼帝國那樣有強大悠久傳統的帝國政權之現代化，也造成了長達兩百餘年的制約和困擾。其次，如所周知，則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為了繼續掌握其豐富的石油資源，對整個中東長期採取多種分化、顛覆、壓制行動，包括通過以色列以及由其本身直接發動戰爭。

今日「九一一事件」之所以發生，美國當局謂為與信奉伊斯蘭教的民族無關，只不過是少數人敵視美國的自由體制所致。這種說法雖有其策略上的考慮，但恐怕難以取信於人，也不會有甚麼效果，殊不值得討論。然而，即使空泛地將事件歸之於西方基督教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仍然一樣未能得要。事實上，已經徹底俗世化的西方之所必不能退出中東，而必須維持目前的高壓政策者，並非有厚愛於以色列，或有深仇大恨於伊斯蘭教，而實在是不願意放棄石油，更不願意見到此資源被利用於當地建設，促成另一強大、獨立、現代化政治體系的出現。從根源上說，這種心理雖或仍然與基督教（乃至所有一神教）教義中的追求擴張與堅持獨佔思想有千絲萬縷密切關係，然而，它所附麗的

希伯來民族必須在強敵環伺中求生存，而《舊約聖經》中顯示的尚武精神亦間接或直接遺傳於由其蛻變而來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兩者之間的軍事抗爭延綿千年之久，其根源恐怕即在於此「希伯來思想基因」。從十七世紀開始，西歐基督教文明逐步蛻變為俗世化的現代文明，其精神載體則轉變為資本主義。今日不斷高漲的全球化浪潮，無疑亦正就是這種動力的最高表現。

理念，其實早已經蛻變為資本主義。所以，一定要將事件歸之於文明衝突，那也只能夠說是以資本主義為核心的現代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而已。

五 在文明的邊緣

不過，也有不少人壓根兒不接受文明衝突之說。他們認為，像劫持民航客機撞毀摩天大廈，導致大量無辜者死亡與及全球經濟衰退這樣令人髮指的事，只不過是野蠻行為，而與文明毫無關係，所以事件實在是「文明與野蠻的衝突」。我們在上文已經仔細論證，在所謂文明社會的戰爭中，殺害無辜平民是常事，所以單單用這一點來區分文明與否恐怕難以自圓其說。不過，平心而論，這一說法其實亦並非沒有道理。道理在於：文明和是否使用暴力、如何使用暴力無必然關係，而取決於它是否能夠為人類社會建構秩序，提供發展方向。在這個意義上，必須承認，西方世界是現代文明主流，它所建立的秩序框架正逐漸向全球擴展，雖然諸如中國、俄羅斯、日本等強大政治體系，也都仍然各自在建構其不盡相同於主流的文明。但是，非常不幸，曾經一度那麼燦爛，不但長期與西歐相抗頡，而且西歐更曾一度要藉之為橋梁，以上接其古代希羅傳統的伊斯蘭文明，今日卻似乎既無力建構（甚或只是提出）其自身的秩序，也不能夠如日本那樣，心誠悅服地接受強加於它的西方秩序，而只能夠在憤懣中以驚人暴力來宣泄它的屈辱、毒恨，這無疑是世界現代化歷程中的大悲劇。

不過，無論我們如何同情伊斯蘭民族百年來的遭遇，卻也無從否認：「九一一事件」只有破壞性而不可能有建設性意義，它即使達到了摧毀資本主義世界的至終目標，也絕不可能由是而建立另一種更為人類接受的美好秩序。所以，它所代表的，是瓦解秩序的力量，亦即是野蠻；它即使成功也還非勝利，而只能證明，無序野蠻力量之大，可以摧毀文明。是的，我們不應該忘記，歷史上瑰麗輝煌的文明總有其邊界，其所追求、崇奉的高尚理念，所建立的秩序，所提供的美好生活，都只存在於此邊界內部，邊界之外則是文明所無法負責，或者不願意負責的黑暗、野蠻世界，中華文明如是，羅馬文明如是，今日的資本主義文明亦不例外。

弔詭的是，在文明與出現於其邊緣的各種野蠻力量無止境的衝突中，文明並不一定能夠克服野蠻，甚且往往因此而走向雖然是極端緩慢，然而卻無法逆轉的衰落。文明所建立的秩序有其時間、空間與規模上的限度，當它的存在或者應用超過了限度，就有為意想不到的野蠻對手所克服、所瓦解的可能。蘇末、巴比倫文明如是，漢唐文明如是，羅馬文明如是，這是大家所再也熟悉不過的；甚至，「西西里晚禱」恐怖主義事件之於那麼強大的中古基督教文明，顯然也可作如是觀。另一方面，也許是由於現代文明委實太強大了——近五百年來它一直在飛躍發展，而且顯然還有無從估計的發展潛能，也許亦由於它已經擴展到全球，好像已經再也沒有邊界，所以，處於其核心的精英人物似乎已經

如果一定要將「九一一事件」歸之於文明衝突，那也只能夠說是以資本主義為核心的現代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而已。無論我們如何同情伊斯蘭民族百年來的遭遇，卻也無從否認：「九一一」只有破壞性而不可能有建設性意義，它的行動即使達到摧毀資本主義世界的至終目標，也絕不可能由是而建立另一種更為人類接受的美好秩序。

忘記了邊緣野蠻力量的危險，認為他們自己所代表的秩序具有自然普世性與永恆性，是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擋或摧毀的。

假如「九一一事件」能有任何正面意義的話，那麼就是它再一趟提醒處身於現代文明之中的精英份子下列可怕事實：正如近20年科學家才非常驚奇地發現，某些最普通，我們認為最熟悉的簡單動力系統，也有其不可預測的混沌區域，同樣，在以高科技力量精巧建構的現代文明核心，如曼哈頓地區者，也可以包藏不測之彌天大禍。換而言之，分割文明與野蠻無序區域的邊界，往往就在文明的心臟之內。也許，所謂的「拉登集團」可以徹底消滅，然而，以今日美國舉國上下所作的反應，所表現的心態來看，我們對賦予此集團以強烈道義感與視死如歸精神的那些信念與怨恨是否有可能消弭或者散失於無形，實在無法持樂觀態度；對西方文明所揭櫫的自由、開放、理性、法治精神，所珍貴的私隱權，所追求的美好社會——這對於大多數在西方文明以外的人也都是充分認同的——，是否仍然能夠維持其發展動力，亦不可能不深深感到憂慮。

也許，必須承認，西方文明精神雖然璀璨奪目，但畢竟仍然有其限度，它所主導的全球現代文明之所以陡然出現這麼嚴重的危機，之所以呈現目前看來那怕是多麼微小的失敗可能性，正就是這限度的徵兆。當然，要求西方社會為人類文明負上全部責任顯然是不公平的。真正的問題是，在這個危機時刻，甚至在危機過去之後，西方文明以外的有識之士，認為他們本身所代表的文化傳統與文明精神又能對解決這樣的危機可以作出些甚麼貢獻呢？

「九一一事件」提醒人們注意：分割文明與野蠻無序區域的邊界，往往就在文明的心臟之內。也許，所謂的「拉登集團」可以徹底消滅，然而，賦予此集團以強烈道義感與視死如歸精神的那些信念與怨恨是否有可能消弭，我們實在無法持樂觀態度。

註釋

- ① 當然，歷史上的邊緣宗教團體亦有發展成主流宗教的可能：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即是前例。但在經過啟蒙運動洗禮的現代世界之中，這樣的可能性非常微小，實際上可以忽略。
- ② 這裏所謂「理性」僅指達到任何明確目標的有效途徑，而並無道德褒貶或更深哲學含義。
- ③ 詳見Steve Runciman, *The Sicilian Vesp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8).
- ④ 有關此教派的歷史，見Marshall G. S. Hodgson, *The Expansion of Islam in the Middle Periods*, vol. 2 of *The Venture of Isla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4), 58-61, 129-31；以及J. A. Boyle, ed., *The Seljuq and Mongol Periods*, vol. 5 of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Ir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8), chap. 5.
- ⑤ Carl von Clausewitz, *On War*, ed. Anatol Rapoport (Baltimore: Penguin Books, 1971), 101.